

《青年经济学者》丛书

QINGNIANJINGJIXUEZHECONGSHU

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 与农村发展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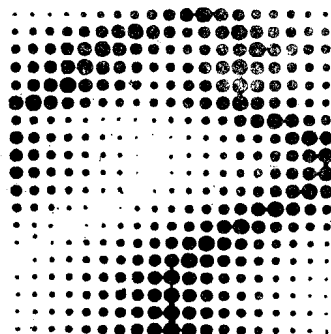
《青年经济学者》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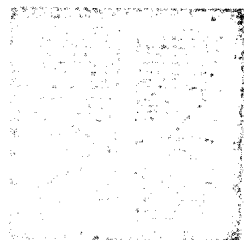
国民经济 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

QINGNIANJINGJIXUEZHECONGSHU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冯国祥

封面设计 王义钢

《青年经济学者》丛书

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
(经济研究报告)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3 字数 230,000 印数 1—6,4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103·129 定价：2.05元

GD(86) 124

21

出版说明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伟大的社会实践呼唤着经济科学的繁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批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在老一辈经济学家扶植下，脱颖而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为了给他们的理论探索成果提供一个发表、交流的园地，推动经济科学为我国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决定编辑出版《青年经济学者》丛书。

丛书的宗旨是：

——反映完稿时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中国籍学者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学术成果。

——理论联系实际，力求作品能够程度不同地回答我国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经济理论课题，并对丰富的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的自由讨论，作品均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出版社和编委会没有倾向性意见。

浙江人民出版社邀请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组成编委会，负责丛书的组稿工作和对书稿的理论内容作出评价。

恳切希望老一辈经济学家、广大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推荐或提供书稿，对丛书内容提出意见和评论，使其成为我国经济科学发育的一块沃土。

浙江人民出版社

《青年经济学者》编委会

前 言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研究报告集，从探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出发，涉及到对国民经济环境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从事这样跨度较大的研究，并不是我们主观的偏好，实在是缘于研究对象本身提出的迫切要求。愈来愈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在我国农村经济变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之后，农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农村必须作出若干历史性的重大选择，才能争得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如果不联系国民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背景，不仅不能作出恰当的选择，而且很可能连问题都无法恰当地提出。因此，在研究我国农村近年的变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从一九八三年起，就着手进行农村发展与国民经济关系的研究和探讨。这份报告集，即是一批初步的结果。

这项研究，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承担的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中一部分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选编。其他部分主要是城乡关系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和宏观调节控制研究等，将陆续发表。

迄今为止，这次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其间，我们这个

研究组，先是建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继而划归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本报告集送付编辑时，又根据工作需要，组建成立了发展研究所，直属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收入本书中的三篇综合研究报告及若干专题研究报告，曾在《经济研究》、《农村问题论坛》、《学习与探索》、《中青年经济论坛》等刊物上发表。编辑和读者提出过热情的修改意见，唐宗焜、杨沐、王晓鲁、丁宁宁、郝一生等同志给予了认真评审，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作 者

1986年6月

目 录

前 言

综合报告

上篇 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 (1)

1 1979—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主要动因的分析 (2)

2 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市场特征 (5)

3 国民经济的新成长阶段 (10)

4 来自选择的发展和繁荣 (17)

中篇 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 (29)

——新成长阶段农村发展的宏观环境

1 农业份额下降：我国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

结构变革的主线 (29)

2 偏差协调：我国经济结构变革的可能方向 (35)

3 协调战略面临的约束和出路 (42)

4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流程的变化 (46)

下篇 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57)

——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积极力量

1 农村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中的地位 (57)

2 农村非农产业的结构分布及其变动 (63)

3 乡镇企业的参与度和结构相似性 (68)

4 深入进行农村产业结构变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76)

专题报告

一 在历史的新起点上 (86)

——六年来国民经济增长分析

二 我国开始进入超必需品消费阶段 (96)

三 近年我国消费市场的变化及其特征 (115)

四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若干特点	(126)
五	后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外部冲力问题	(140)
六	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对政府和企业经济行为的新要求	(153)
七	城乡经济关系的几种可能前景及其对国 民经济总增长的影响	(180)
八	关于种植业发展的几个战略问题	(190)
九	纺织工业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结构变革	(212)
十	机械工业与农村发展	(251)
十一	建筑业的现状、发展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267)

综合报告(上篇)

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

1. 我国农村经过六年成功的变革,面临着新的形势。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里,拥有八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必须作出若干新的重大选择,才能争得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在今天,要恰当地提出我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就不能仅限于了解农村本身的要求,而应当联系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来考虑。在新形势下研究农村发展问题的难度,显然大大增加了。这是不可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困难。

2. 本报告对我国农村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新的国民经济环境,作了初步的讨论。第一部分分析近年国民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第二部分通过当前我国消费水平和市场特征的描述,指明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第三部分提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概念,并参照国际经验刻画了我国经济新成长阶段的特点;第四部分对我国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中的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选择作了一些判断,着重指明这些选择将在相当时期内产生深远的影响。

3. 本报告是对若干专题报告的综合。这批研究成果,主要是提出研究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据,而远不是对问题的回答。需要说明,这些依托近年对农村问题的调查和对其他方面研究成果所作的综合性判断,精度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能力所能及地把问题限定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因此,本报告就非常需要从其他角度得出的认识和更全面的分析,来加以校正、修订和补充。

1979—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

主要动因的分析

4. 1979—1984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8.96%,国民收入每年平均递增7.92%,分别比1978年以前二十六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提高1.03%和1.94%。如果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来分析,则由年平均增长3.9%提高到6.6%,显示出高速的特征。〔1〕〔2〕*

近年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国民经济原有体制下累积起来的经济潜力的释放。平均主义大锅饭加上重型结构,导致供给方面压抑着巨大的增产可能,需求方面潜藏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常规性的调整加上体制改革这一新因素,有力地触发了两大潜能的释放。

在这六年中,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最突出的是农村经济巨变、城市就业扩张和规模空前的住宅建设。国民经济的整体特征开始发生变化,摆脱以积累为中心的状态,转向消费需求为主导。类似的调整效应在六十年代初期也出现过。但此次大不相同的是,在调整过程中启动了原有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农村率先“引爆”。联产承包制宣告了“大锅饭”的终结,引起农产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1979—1984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8%,其中种植业年均递增6.61%。由于农户成了独立

• 本文所引用的资料,均统一在文章最后“参考资料”中标明出处。文中右上角所标数码,是指“参考资料”中所列资料的编号。

本报告所引1985年及以前各年资料,主要来自有关统计报告或统计文件,为便于读者查核,仍用资料出处的计量单位,有些仍用斤、担等市制计量。请读者注意。

的商品生产者，因此价格的刺激功能大大增强。基本农产品加价敞开收购，加上市场逐步放活，导致商品粮食和棉花出乎意料的高速增长。1979—1984年，平均每年增产粮食340亿斤，棉花1,300万担，人均有粮从637斤增到790斤，人均有棉从4.5斤增到11.8斤。^{〔1〕〔2〕}

农产品供给激增，引起农民货币收入的激增。1978年全国农村生产队和社员出售产品的货币收入为580亿元，1984年已达1,501亿元，共增加921亿元，年均增长17.2%（1953—1978年年均增长为5.5%）；从1978年到1983年，农民的净货币收入由381亿元增长到1,127亿元，年递增24.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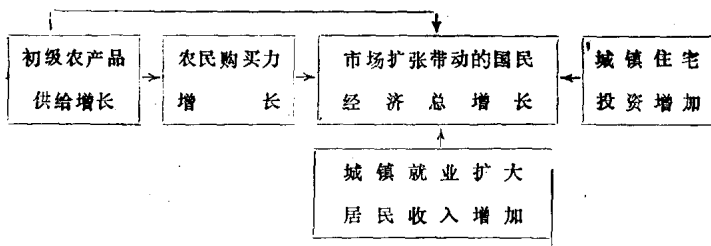
农民的货币收入增长，成为国内市场扩张的一大支柱。据我们匡算，在1978年到1984年新增加的1,798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农民。1984年全社会购买力中，农民占到52.5%。

于是，从市场需求方面刺激了工业供给。1979—198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88%。^{〔1〕}分析下来贡献因素很多，但同农用生产资料、输入农村的基本生活用品（包括农业初级产品的加工品）的流量扩张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农民的货币收入还投向工业生产，直接引起工业品供给的扩大。1979—1984年全国乡镇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加17.9%，1984年全国乡镇工业产值已达1,031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6%。

5. 1979—1984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流程，以图表综1这个框图来示意。

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匡算了各主要独立变量对国民经济总增长的贡献份额。1979—1983年所增加的社会总产值中，由于消费增长而能够说明的占79%，由于积累增长而能够说明的占21%。在新增的消费中，农民占64%；在新增的积累中，农民（仅计农村住宅投资）约占56%。这样综合起来，农民的消费和积累增长能

图表 1



够说明国民经济总增长的62%以上。换句话说,近年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的近9个百分点中,约有5—6个百分点来自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初级农产品的超常规增长,构成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动因,这是1979—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格局的一个基本的特 点。

6. 以上增长格局的基本前提,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产品的供不应求。这个前提逐渐被累积的增长所动摇。大体上从1983年开始,粮食和棉花即开始出现低水平的剩余。我国突然遇到了基本农产品的“仓容危机”,这至少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如果继续执行加价敞开收购政策,那么预计到1986年粮食总过剩量将达2,000亿斤原粮,需占用国家收购资金400亿元,其中财政直接拨付的加价款达140亿元,这显然为我国现实的有购买力的需求和财政实力所不堪承受。由于需求的强制制约,种植业的高速增长势头将合乎规律地渐趋减缓。事实上,如果能够继续成功地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那么就国内需求而言,从现在起到2000年的十几年里,我国并不需要粮食的平均年递增率超过3个百分点。棉花亦是如此。由此,面临的尖锐问题是,我国农村如果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格局,那么在原有格局中刺激增长的主动因,就可能成为经济衰退的主动因。

7. 1979—1984年国民经济的 增长格局,究竟能否继续维持?

改变这套格局，究竟又有几种可能的方向？这些问题，都涉及收入、消费和市场。为此必须对我们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平有个基本的判断，对当前市场特征有个大致的分析。这不仅是理解国民经济何以在高速增长中发生转折的关键，也是把握转折所面临的新选择的关键。

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市场特征

8. 从总体上看，我国人民以温饱满足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已经结束。

1979—1984年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每年递增6.59%。1982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400元，1984年达到532元。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人均175元，增长到1983年的288元，每年平均增长10.48%。根据家计调查资料，1983年农村人均收入低于150元的户占7.6%，城市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25元的户不足3.6%。^{[1][2]}

在这样一种收入水平及其增长动态下，我国居民实际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如下：

(1) 平均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达2,877.4大卡，蛋白质82.8克，脂肪47.2克。^[1]其中热量摄取部分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中国人热量摄取标准（2,360大卡^[3]）22%，超过我国生理学会测定的我国人民对热量的合理需要量（2,480大卡^[3]）16%；蛋白质摄取部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69.4克，1978—1980年^[3]）；只有脂肪部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 各种布匹的人均消费量达到31尺，比1978年增加近30%^[1]。衣着开支的绝对额增加很快，但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则比较稳定，城乡分别为14%和11%左右^[1]。

(3) 用品消费总量增长很快，在消费开支中的比重开始上升。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日用品类、文教用品类和书报杂志类合计，1979—1983年平均每年递增16.95%，明显高于其他各类商品的增长速度。^[1]

(4) 城镇人均住房5.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11.6平方米，分别比1978年增加40%和43%。农村居民的住房开支比重由1978年的3.2%上升到1983年的11.1%。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城镇住宅投资1983年比1978年增长2.19倍。1983年住宅的总投资(包括城乡私人建房)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8.8%。^[1]

由于我国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由国家财政补贴的部分相当大，因此从家计调查得出的恩格尔系数比真实数值偏高。校正后的数值，城市职工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约40—45%；农民家庭为50%。经过校正的数值，仍表明我国人民的食物消费比重明显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40%以下)。

9. 通过其他生活质量指标来分析，并与国际水平作比较，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世界银行统计了人口超过100万的126个国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在第102位，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10美元以下)；但中国人均热量摄取占第62位，婴儿死亡率占第60位，成人识字率占第47位，预期寿命占第46位，出生率之低占第32位，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6][7]}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数”在全球的位次，大大高于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的位次。

可以判定，正是近年国民经济的增长，才使我国普遍地结束了以温饱满足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随着这个消费阶段的终结，继续扩大初级农产品和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已不再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这就是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不再是以低层次消费的满足来推动发展。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质的变化。

10. 在温饱有余的基础上,新的消费特征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出现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直观印象和统计调查一致表明,必需品中选择性强的商品普及城镇,扩展到农村;非必需品正由城市到乡村向消费领域进军。最集中的表现是不同种类消费品的需求对收入的弹性发生了变化。大体上是城乡居民的食品收入弹性都降到0.7左右(其中城市副食部分大于1);而用品、住宅、某些服务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其中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的收入弹性高达3以上。

消费市场变化的总趋势是必需品的销售增长率减缓,非必需品的销售增长率大大提高。1977—1983年期间,27种日用必需品零售额平均每年递增9.1%(其他商品递增16.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40.6%降为1983年的32.7%;手表、自行车、电视机等三种耐用消费品在日用品和文教用品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6.3%上升到1983年的26.8%;^[3]15种最基本用品的农村零售额占农村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到1983年已降为9.5%。

11. 在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旧的消费特征的消失和新的消费特征的产生,都不是情遂径直地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当前我国消费品市场上值得注意的特征是:

(1) 必需品的供求机制远未理顺。主要的生活必需品长期靠指令生产、统购包销、价格管制、票证限额和消费补贴,几乎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随着必需品满足程度的提高,消费趋向多样化,原有模式就不足以灵敏地、准确地传递需求信息,以指导供给适应需求,重新合理配置资源。比如恩格尔系数偏高,相当突出地说明由于对必需品供求的行政性干预,已导致社会无从及时了解必需品的真实需求量,从而延滞了向新的消费阶段的过渡。

(2) 消费者的购买主权远不是充分的,但在此条件下也发生

了购买力“热点”从必需品转向非必需品。由于诸多必需品的消费补贴暗含于价格之内，因此消费者减少消费等于放弃了一份福利；另一方面，非必需品主要遇到供给限制，而其价格并不能恰当地反映供求，往往有价无市，形成持续的紧俏。因此，无论对必需品还是非必需品，购买决策都受到失真信号的干扰。尽管如此，购买力“热点”也已经转移了。粮食年均增长4.9%而过剩，但彩电目前月产量已达1978年年产量的43倍而仍然供不应求。这种状况同日本五十年代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似乎很相似。不难断言，如果消费者有比较充分的选择权，那么上述“热点”转移的特征会表现得更早、更明显。

(3) 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比较突出。1978年以来，社会结余购买力总额平均每年递增29.5%，大大超过居民货币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这部分结余不可能都转为现实购买力，但从储蓄意向调查分析，待购倾向相当强烈。

但是，在几百亿待购的货币找不到适销品的同时，又有几百亿不对路的商品积压在库。长期紧缺与长期积压并存。看来，既没有足够强烈的信号通知社会将过剩产品的资源转投入供不应求产品的生产，也没有形成能够对这种信号作出积极反应的生产体系。

(4) 无论必需品过剩、购买重点转移还是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发生，都极为集中和迅速，这是又一个重要特征。正在宣传粮棉不够，突然发现仓库不足。“老四大件”从1980—1982年的购买洪峰（每年零售量上升的百分点都达两位数），陡然跌入1983年的低谷（如收音机从上年增长17.9%跌到下降15.2%，缝纫机从上升23.0%跌到下降10.6%）^[3]，致使许多受“景气信号”刺激的企业措手不及。目前，浪潮又涌向新兴家用电器，据调查材料推算，全国城镇居民手中有近300亿购买力集中在“新六件”（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电风扇、照相机）上，其中准备

用于购买彩电的占24%。

这样的需求格局，生产体系非常难以应付。时兴产品的寿命周期过于短暂了：初期投入时市场反应并不强烈，但紧接着就是急剧的膨胀和扩张，一般来说，愈是耐用消费品，产业链条愈长，生产能力的形成愈需要时间。购买洪峰来得过于迅速和集中，根本无法带动国内产业。等到各地竞相引进成品和生产线，市场又趋于饱和，新的过剩马上来临。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为市场的“同步性震荡”。

形成“同步震荡”的原因比较复杂，归结起来，主要是：收入分配平均化，从而使消费过程缺乏层次和梯度；必需品供求机制尚未理顺，许多重要的消费通道没有得到开辟（如城市住宅），限制了一部分需求的正常增长；社会交往结构过于单一，同收入层中没有形成众多的各具特性的消费集团；加之消费示范和引导无力，助长了盲目攀比的社会心理。

当前消费品市场的以上特征，既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必须有一个早就该有的结构变革，又反映了完成这个结构变革具有相当的难度。

12. 我国消费需求正在转入非必需品的比重急速上升的新时期，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个转折要求国民经济的增长格局完成一次大变化。由于市场机制不发达，以及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上述演进趋势不仅不能充分表现出来，而且时时受到一些因素的扰动。1984年下半年后，一些市场重新出现绷紧的现象。若干城市发生的涌购风潮，在某些时间区段里甚至波及到必需品。因此引起总需求膨胀的判断。研究和政策的重心不得不转向总量控制，只好把结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由于分析方法不同，必需品过剩的结论本来就没有被普遍接受，市场小有波动便使人感到不踏实。不过，还是可以看到，货币投放量增长过猛等因素，并没有改变市场的基本矛盾即结构性矛